

章甫地景書寫之敘述策略及 本土視角的開啟*

龔 詩 堯**

摘 要

章甫被譽為清代乾嘉年間臺灣文壇第一人，於文學史上具有開創者的重要地位。本篇論文嘗試映顯章甫筆下，臺灣地景與大陸地景之辯證關係，說明他原受到宦遊文人的影響，偏好將中土秩序與美學汲引至作品裏；然而，隨著個人境遇改變，逐漸調整了敘述手法。除了藉典故將兩岸進行參差對照，突出臺灣的獨特性之外，亦時常設計具備嚮導功能的角色，帶領讀者以嶄新的方式遊觀景致，於有限空間裏延展出未能窮盡的無限層面。在年歲與見識的催化下，呈現出由外拓轉為內省的傾向，一定程度跳脫了宦遊文人之慣性視角，呈現出與傳統有所延續、亦有所離異的審美經驗。

關鍵詞：章甫、地景書寫、記遊散文、角色設計、本土視角

2025.04.25收稿，2025.10.22通過刊登，2025.12.04修訂稿收件。

* 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使得本文更臻完備，謹申謝忱。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The Narrative Strategy and Local Perspective of Zhang Fu's landscape Writing

Koung, Shih-Yao^{*}

Abstract

Zhang Fu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ry figures in Taiwan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His *Ban Song Ji* is the first published indigenous author's collection of poems in his own name, marking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literary history. This thesis takes Zhang Fu's landscape writing as the primary object of analysis. It argues that his early works were shaped by the influence of literati officials, reflecting an inclination to incorporate imperial order and aesthetics into his writing. However, as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evolved, he gradually adjusted his modes of travel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addition to employing allusion to contrast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and highlight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aiwan, Zhang Fu frequently introduces guiding figures—such as mountain monks, elders, and fishermen—to mediat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island's landscapes. Over time,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age and experience, his observational mode shifts from outward extension to inward reflec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enables him to move beyond the inherited perspectives of literati officials and to develop a more differentiated aesthetic sensibility, thereby renewing both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his writing.

Keywords: Zhang Fu, landscape writing, travel prose, character design, local perspectiv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一、前言

結合了實踐活動與審美意識的地景書寫，¹ 是歷代文人描摹自然、陳述見聞或對社會問題提出見解之重要媒介，透過再現其所觀視的山水城鄉，既能展示獨特的風土民情，也往往涉及他們如何感知時空、產生怎樣的精神體悟，甚至流露出家國想像及主體認同等政治傾向，具有複雜的文化意涵。自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即陸續有宦遊文人因不同緣由而抵達這座新附島嶼，並採取各種形式描繪各種與中土迥異的境況。

其中，以個人視角進行敘述的記遊散文，由於篇幅大小及表達樣態極具彈性，較清楚地載錄了臺灣的地理、物產、氣候或風俗習慣等面向，為山光水色及百姓生活方式留下珍貴資料，亦呈演出作者接觸異域而引發的主觀心境。清代關於臺灣的記遊散文，以康熙朝的郁永河《裨海紀遊》作為起始，其後有藍鼎元〈紀水沙連〉、〈紀火山〉等文，對日月潭與世隔絕、關子嶺水火同源之奇景展開陳敘；而陳夢林〈望玉山記〉突顯了玉山有別於對岸名山的神秘感，又為諸羅縣（今嘉義）不知何時開鑿的湖泊命名為「北香湖」，並撰文讚嘆荷花於凜冬與梅菊爭豔之美。基本上，宦遊文人的作品總被中土價值及帝國的統治意圖所牽引，² 故作者看待臺灣的目光不免帶著一種自外於斯的疏離感，筆下地貌往往透射出明顯的異質性，在發現風景、建構風景的同時，也以心目中的文明來詮釋「臺灣」這個蠻荒的邊境。

然而，本土文人因為出身的關係，與臺灣山水之間的親和度有別於宦

¹ 地表上可以視覺、聽覺、觸覺等身體感受認知到的景象，稱為「地景」（landscape），包括了自然形成的「自然地景」（如地貌、地質等），以及經由人類活動創造的「文化地景」（如人工建物、風土民情等），隨著時空變遷、觀看角度與體驗方式的差異而被形塑出來。邁克·克朗（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2006），頁27-28；約翰·威利（John Wylie）著，王志弘、錢伊玲、徐苔玲、張華蓀譯，《地景》（新北：群學，2021），頁1-21。本篇論文所論「地景書寫」指涉作家透過文學手法再現特定風土，並傳達自己如何認知、如何感受之作品，一方面呈現個人活動的蹤跡，一方面將想像或歷史記憶融入，可謂人地互動的結晶。藉由章甫對地景的描繪，分析他遊歷心境與認同對象的移易，這類作品反映了對土地的關懷及歸屬感，而非獵奇式的蒐尋，使其本土視角得以辨識。

² 田啟文，〈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的特色及其影響〉，《東海中文學報》17期（2005），頁93-126。

遊文人，儘管受到後者的影響甚鉅，卻在題材及關懷重心上逐漸產生差距。被推崇為「乾隆、嘉慶年間臺灣文壇第一人」的章甫（1755-1816?），³ 其《半崧集》為臺灣第一本付梓的本土作家個人詩文集，⁴ 作品豐富、形式多樣，初步扭轉了清領時期以宦遊文人為主的文壇情狀，具有開創者的重要地位。《半崧集》雖按體裁分為詩歌、駢文及雜文三部分，詩歌數量卻遠遠超過後二者；⁵ 但就當日的時空環境來看，章甫之散文呈現出獨特的意義，生動地載述臺灣的風物，並非只是面對各種社會關係而書寫的應酬遊戲之作，同時也藉由特殊的敘事策略來表達自己對土地、對傳統的省思，無論從藝術或歷史的角度來看，都是值得關注的撰著；除此之外，駢文〈臺陽形勝賦〉及詩作更提及大量景點，隱約展現出他在觀看山水時所萌發的本土自覺。

臺灣文人究竟於何時產生較明晰的本土意識？不同學者的觀點略有差異。李知灝認為清領時期「對這塊自本自根生長的土地及人民有著深厚的情感。因此，在政治禁制漸馳的情況下，開始有貼近百姓脈息，關心民瘼的文學作品產生」，⁶ 所舉案例為嘉慶年間作品，稍晚於章甫；另如田啟文以

³ 章甫，字申友，號半崧，臺灣縣（今臺南）人。其生平參考陳貽庭，《臺灣才子》（北京：九州，2003），頁7。關於章甫之生年，沿用盧錦堂，《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1），頁231。另有乾隆25年（1760）之說，然章甫《半崧集·自序》作於嘉慶21年（1816）三月，自云：「老不廢吟，六十年來不知何以一往情深也」，由其詩〈甲子五十感懷〉研判，「甲子」即嘉慶9年（1804），故可證其生年為乾隆20年（1755）。章甫的出身地亦曾引發歧見，一說為福建泉州人，三十二歲始來臺，然按其〈先考妣行略〉所述，再加上章甫母舅吳必達為臺郡恩貢等史料，可確認章甫為臺灣本土出身，福建泉州為其祖籍。

⁴ 《半崧集》原為八卷，嘉慶21年由章甫的學生門人編輯付梓，惜已亡佚。現存較完整者，為日治時期大正6年（1917）謄錄之六卷抄本。由於章甫對自己的作品並未刻意保存，故《半崧集》的作品並不完整，《臺灣詩錄》、《臺灣詩乘》、《重修臺灣縣志》等籍著亦收錄部分。以詩而言，比《半崧集》收羅得更完備的是《全臺詩》，第參冊蒐集章甫之詩四百多首。參考陳漢光編，《臺灣詩錄（中）》（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頁555；連橫，《臺灣詩乘（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5），頁150；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參冊）》（臺北：遠流，2004），頁304-403；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臺灣先賢集（第二冊）》（臺北：臺灣中華，1971），頁805-893。

⁵ 詩多於文的創作現象，並非章甫個人特有，而是早期臺灣文學家（包括遊宦文人）的共同現象。參考田啟文，《臺灣古典散文研究》（臺北：五南，2006），頁3-4。《半崧集》所收文章數量與詩歌比例懸殊，前者只有32篇，包括駢文15篇和雜文17篇。

⁶ 李知灝，《從蠻陌到現代：清領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景書寫》（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頁139-141。

清道光年間至臺灣任職的姚瑩〈噶瑪蘭廳異記〉、日治時期彰化文人洪棄生〈遊珠潭記〉、王石鵬〈臺灣三字經序〉為例，認為題材及精神內涵「充滿著濃厚的臺灣意識與臺灣面貌」，⁷時代更晚。綜合各家資料，乾、嘉時期可謂臺灣文學的萌芽期，而章甫正是這時期映顯本土價值的先行者；他的部分詩作運用方志對自己居住的空間進行演述（如〈遊打鼓山〉），也嘗試陳敘寧靖王朱術桂五妃殉難等具有當地傳奇色彩的歷史（如〈五妃廟〉），同時對於社會風俗亦有相當關懷（如〈井亭夜市〉）。漢文文學淵遠流長，既是豐富的資產，卻也因累積過於深厚而不易突破，章甫之重要性不僅在他最早以本土作家的身分刊印個人集著，又因為他透過吟詠、記錄，對這座島嶼的景致深入察照並加以銘刻，一定程度跳脫了宦遊文人的慣性視角，展現出與傳統有所延續、且有所離異之審美經驗，間接地帶動了內容及形式的更新。

目前學界對章甫的考察主要聚焦於詩歌這一體裁上，⁸其中余育婷〈試論章甫詩歌中的空間書寫與美感特質〉從章甫筆下的山水、八景與寺廟名勝，抉發出空間建構背後的心理意識，在探討章甫受清代詩學之深刻影響的同時，亦指出此類作品多以悠然豐足的基調呈現臺灣地景，文字所透射的安全感及認同感其實已經觸及本土意識的萌芽。⁹然而，由於詩歌的篇幅較短、重視含蓄蘊藉的情致，使得提供的線索略顯隱晦，需要更明晰的資料加以強化，散文、駢文恰可彌補這個缺口。可惜的是，章甫之文尚未見專門論述，即使偶有敘載，泰半為概略性介紹，¹⁰難以就文章之結構或藝術手法進

⁷ 田啟文，《臺灣古典散文研究》，頁5。

⁸ 例如廖一瑾《臺灣詩史》主要介紹章甫〈臺郡八景詩〉，而劉麗卿《臺灣八景與八景詩》亦述及章甫與八景相關作品，余育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則論證宦遊詩歌對臺灣文人的影響。參考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1999）；劉麗卿，《臺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文津，2002）；余育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新北：稻鄉，2012）。

⁹ 余育婷，〈試論章甫詩歌中的空間書寫與美感特質〉，《臺灣文學評論》9卷1期（2009），頁264-280。

¹⁰ 如徐慧鈺《鯤島逐華波：清領時期的本土文人與作品》第三章第四節介紹「文氣卷舒的章甫」；向麗頻〈清代臺南地區詩文社研究〉依據章甫駢文〈選定同人贈和齋詩序〉交待章甫參加詩社，往來酬答之事。參考徐慧鈺，《鯤島逐華波：清領時期的本土文人與作品》（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向麗頻，〈清代臺南地區詩文社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明清時期的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2002），頁170-197。

行分析，也無法議證空間屬性變化的痕跡。另如賴恆毅《清代臺灣地理空間書寫與文化敘事》的研究範疇含括詩、文、賦等不同體裁，嘗試廓清清代文人對所居環境之「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滲入情形，探索他們如何辨識海洋、山岳、河川、原漢聚落等場域，藉此掌握臺灣地理空間被建構的衍變過程，運用人文主義地理學而開展的議題具有高度統合性，值得參考。¹¹然因論述的時代跨越清治二百多年，章甫之作僅成為說解「山岳書寫」章節的眾多案例之一，也就難以呈現埋設於藝術手法裏的思想轉折。

本篇論文擬以章甫〈郡守蔣金竹太史遊龍潭記〉、〈遊清源洞記〉、〈遊鯽魚潭記〉、〈遊火山記〉四篇遊記散文作為主要考察對象，並參酌駢賦及不同形制的詩歌，嘗試透過歷時性比較，分析章甫原本偏好將中土的秩序與美學汲引至自己的作品裏，但隨著時間遞轉、個人際遇有所改變，開始突破以往宦遊文人的言說方式，藉由援用典故以進行參差對照、塑造具備嚮導功能之角色等敘述策略，帶領讀者進一步認識這座島嶼，而在年歲與見識的催化下，逐漸呈現出一種由外拓轉為內省的觀照傾向，並對其關鍵性轉折點加以探索。據此延伸，本篇論文主要突顯的問題框架是：在章甫筆下，臺灣地景與大陸地景具有何種辯證關係？經過了清朝文明的洗禮，曾一度熱切地融入帝國語境的臺灣文人，又如何發現儘管自己存在於邊緣，但未馴、不馴的野性與逸出傳統的特質亦有本身的價值？從而敷演臺灣與中土相互定位之複雜。

需要說明的是，《半崧集》目前僅存日治時期大正6年（1917）謄錄之六卷抄本，典藏於國家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較常見的出版品《半崧集簡編》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於民國53年（1964）刪存原書編輯而成，其卷六選輯文26篇，分為駢文14篇、雜文12篇。¹²兩者比對：章甫的駢文多為祝壽或哀悼之文，《半崧集簡編》僅刪去〈贈友納寵序〉一篇，為其詩〈贈友納寵〉四首同一事之作；雜文所刪5篇：僅〈哭翔兒文〉可為詩作〈癸酉（1813）冬夜翔兒入夢哭成一律〉補充，而宗教信仰性質的〈鐘馗食鬼贊〉、〈關夫子贊〉介乎韻散之間，另外兩篇〈祭大魁星文〉、〈財神贊〉

¹¹ 賴恆毅，《清代臺灣地理空間書寫與文化敘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¹² 清·章甫，《半崧集簡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本文所引章甫之作俱出自此版本，故以下將於正文直接標出頁碼，不再另行加註。

更是不完整的集句之作，故均與本篇論文論題無關。另有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9冊亦收錄章甫《半崧集》之文；¹³ 經過比對，實未將《半崧集》卷六全部32篇文章收錄，僅將《半崧集簡編》26篇重新整理轉印，反而增添錯字。故本文引用文章乃採用《半崧集簡編》，以便查核。

二、中土秩序與美感的汲引

對於早期來臺的宦遊文人而言，他們面對這座島嶼的最初印象幾乎都是一個未經開化的茫昧之地，充滿了空間與心理上的陌異感。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1634-1702）在〈修建臺灣府堂碑文〉裏，即以「溪深林茂，易於伏莽；山海氣濕，又多霧露水土之害」形容自然環境，認為群眾「非俘掠之遺黎，即叛亡之奸宄」，而原住民則「無姓氏，無歲月，無冠履衣服之儀，無婚嫁喪葬之禮，不知法紀」，¹⁴ 這類紀錄罕見對臺灣風土的正面描述，透露出宦遊文人始涉帝國邊陲、未能妥善融入的複雜心態。然而，隨著宦遊文人對這片土地進行實質的修整，在一次次勘察中變得熟悉、親切，並以文字展開繪敘及歌詠，臺灣終於從「荒野窮鄉」之類的認知，逐漸被置入具有古典美感的語境裏，例如由福建漳州調至臺灣擔任海防捕盜同知的齊體物（？—？），將在斐亭聽濤的情景與過去於武昌夜吟的經驗互相比擬，¹⁵ 藍鼎元（1680-1733）讚嘆水沙連景色秀麗，無異於神話裏的蓬萊、瀛洲；¹⁶ 經由歷史的召喚，臺灣山水與古代詩文裏的山水取得類似的價值，也就被收編於中土的秩序之中。

章甫早期作品明顯受到傳統典籍與宦遊文人的影響，故其筆下的臺灣風物往往被渲染得與中土景緻極為相似，具有明顯的菁英階層色彩。例如今存四篇遊記散文中最早的一篇〈郡守蔣金竹太史遊龍潭記〉，撰寫於乾隆36年（1771）：

貴陽太史蔣金竹，守閩漳，調臺郡……嘗言人生如鴻指鶴迹，隨處寄

¹³ 黃哲永、吳福助等編，《全臺文》（臺中：文听閣，2007）。

¹⁴ 清·季麒光，《蓉洲詩文稿選輯》（香港：香港人民，2006），頁87。

¹⁵ 齊體物，〈斐亭聽濤〉，清·高拱乾纂修，周元文增修，《臺灣府志·卷10》（臺北：遠流，2004），頁496。

¹⁶ 清·藍鼎元，〈紀水沙連〉，《東征集》（上海：上海古籍，2010），頁427-428。

託。豪於興建，宦臺尤多。公餘之暇，每樂於龍潭是遊……環潭漁樵耕牧，於是乎在。辛卯花月望，構山亭水閣；釣艇鞦韆，歌舞與民同樂，熙熙焉如登春臺云。隔岸虹橋飛渡、紅霧綠陰，有蘇隄煙柳意。潭中張紗幔畫舫，扇扇窗開，似米家船然；名公、鉅卿、紳士相與臨流觴咏。於時百花繡簇，四面錦鋪；魚鳥飛躍，都供幽賞。太守管領物勝，袖山圖之古、磨水鏡之平，未之竟也。暮靄已橫落照中矣，興復不淺。張燈水面，萬點星羅；洗爵更盞，不醉無歸。人海爭觀，訝為蜃樓縹緲。頃月浸水心，畫舫隨流上下，歌聲遏雲如奏鈞天；仙吏宛在月中遊也。（頁77-78）

龍潭即鯽魚潭，¹⁷ 可說是章甫最著意描寫的地點，不僅為之賦詩多首，還包括兩篇散文。撰寫此文時，章甫年僅十七，尚處於生員階段，這是他對自己跟隨官長游賞的記錄，很可能隱含著向官長展現文采的用意。〈遊龍潭記〉之執筆者雖為章甫，但核心人物實為來自貴州的臺灣府知府蔣允焄。蔣允焄在臺任內建設甚多，¹⁸ 由於政聲良美，乾隆36年離臺前，民眾勒有去思之碑，¹⁹ 而章甫〈郡守蔣金竹太史遊龍潭記〉就作於蔣允焄離臺當年的舊曆二月十五、六日。文章的架構頗似歐陽脩名篇〈醉翁亭記〉，第一部分敘述興造的過程，其後敘述遊的過程；兩篇文章都描繪官員與民同樂景象，藉以側面顯示其政績。然章甫之寫作目的卻與歐陽脩有決定性的差異——被貶謫至滁州的歐陽脩表達了反璞歸真、入鄉隨俗的心境，章甫則偏向讚揚蔣允

¹⁷ 康熙晚期《臺灣縣志》：「龍潭，即鯽魚潭。修而不廣，綿延三十餘里」。清·陳文達等纂，《臺灣縣志》（臺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95），頁207。

¹⁸ 蔣允焄於乾隆28年（1763）移知臺灣府事、次年獲任分巡臺灣道，因俗為政，與地方仕紳、名流往來密切，故時人多贈以詩文。蔣允焄任內建設包括整修府城七寺八廟之一的法華寺，隔年又在寺前新鑿「南湖」，用以蓄水防洪，就湖畔建「南湖書院」，獎勵文教，並在堤畔修築有亭臺樓閣，又名為「半月池（湖）」，邀集文士美人相遊，並在端午節時舉行龍舟競賽，成為當時仕紳勝事。除此之外，蔣允焄還改建海東書院，培育人才，建半月樓，法華寺乃成為名勝，與鴻園、道署禔室等合為十三勝之目，成為府城官紳讌集之地，產生諸多相關文學創作。參考蔡承豪，〈清代臺灣府署「鴻指園」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8卷2期（2020），頁137-196。

¹⁹ 黃典權、葉英、賴建銘纂修，《臺南市志》（臺南：臺南市政府，1979），頁218；李汝和等，《臺灣省通志：人物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11），頁163。

焄將臺灣府改頭換面、把蠻荒轉變成文明的功勞，大抵從地方官員的位置發言。遊潭時，蔣允焄身邊簇擁著「名公、鉅卿、紳士」，展現出來的是「管領物勝」之治理才能，與百姓的距離甚遠，漁樵耕牧僅退居為模糊背景之一隅，幾乎沒有成為關注的焦點，全篇隱約帶著一種「統治者的凝視」（magisterial gaze），²⁰ 呈現了由上往下俯瞰的觀看方式，於是形成一種照覽／被照覽之高低權力關係，也就透露出章甫並未真正融入民間。從而亦可以理解，章甫書寫此潭大多以「鰲（魚）潭」名之，唯獨此文採用「龍潭」一詞，應是配合這個帶有應酬意味的場合所作的改變。

〈遊龍潭記〉採取不少華美的字詞進行敷演，並援引頗多典故，包括〈陋室銘〉、〈老子〉、〈蘭亭集序〉等，另如「洗爵更盞」等句亦令人聯想起〈赤壁賦〉，又與北宋米芾（1051-1107）乘舟載書畫遊覽江湖之佚事相比附，全篇力求典雅和反映博學，這是章甫極為明顯的書寫傾向：

章甫作詩一向講究鍊字，少見淺白俚俗的文句……詩中運用許多雅致文字來描述靖海寺的幽靜，其「春遊」的體驗與宦遊文人在空間書寫所抒發的內容大同小異，且典雅的美感特質亦十分相似……章甫筆下的文本空間，固然有個人內在情感的投射，但其書寫題材、抒發內容、以及詩歌美感，都與方志藝文志、宦遊文人的空間書寫不謀而合。這樣的相似雷同，固然有情感的相互共鳴，只是，除此之外，亦不能忽視權力的無形影響，促使秩序空間的再現，並再現一理想的想像空間。²¹

儘管描繪的是臺灣風物，卻因為複製了古代文士的交遊方式，大量植入傳統意象及修辭，使得地域質素變得十分稀薄，這與當時文化傳承的脈絡息息相關，亦可謂被中土秩序同化的景色，同時又是被知識分子之美感馴化的景色。經由這種陳演，章甫彌補了自己未能親臨對岸名勝的遺憾，也透過對蔣允焄的稱頌來提醒讀者，臺灣不再只有蠻徼荒地之樸質野趣，已然具備毫不遜於江南或湘浦的優雅。〈遊龍潭記〉與宦遊文人習慣偏向經濟、軍事等實

²⁰ Laura Malosetti Costa, "Politics, desire and mem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in the Argentine pampas", *Journal of Visual Art Practice* 5.1-2(2006), pp.107-119.

²¹ 余育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頁84。

務性敘述不同，也和懷抱著獵奇心態之偏見有所區判，²² 章甫以精緻的文字悄然將臺灣轉化為中國的延伸，消解了中心／邊緣之間的歧異；然而，掙脫了過往臺灣書寫的制約，卻又跳進了另一重更巨大的制約——召喚古典詩意的結果，不免抹除了真正屬於自己的特徵，讓畫舫、蜃樓、蘇隄煙柳、臨流觴咏等文化符號完全取代臺灣略顯粗礪而生氣淋漓的景色，反客為主，於是龍潭的樣貌就被典籍裏的掌故或傳說所覆蓋，營造出如夢似幻的世界。

以中土之景代換臺灣之景的表述方式，在康熙朝高拱乾〈澄臺記〉已見端倪。高拱乾對臺灣的感受原是「厥土斥鹵」的荒僻之地，建造澄臺以後，登臨時即能「盡釋其絕域棲遲之歎，而思出塵氛浩淼之外」，故發出「則斯臺比諸『凌虛』、『超然』，誰曰不宜？」的感懷。²³ 申惠豐認為，將澄臺與「凌虛」、「超然」等名臺相互比擬，突顯了高拱乾之意識形態，從歷史汲取遊於物外的超越性空間經驗，並將此空間納入帝國文化之言說框架。²⁴ 章甫的敘述同樣隱含類似的官方想像與菁英階級思維，差別在於，從泉州抵臺的高拱乾經由這種鋪陳，將帝國文明引入以安頓身心，始終讓自己成為一個站在外部的觀察者，而具有在地身分的章甫雖然同樣大量搬演傳統修辭，主要是想讓臺灣歷史獲得填充、延展，與中國歷史理想地接合，從華夏文化的「外部」轉為被接受的「內部」。

細加考察，章甫筆下不少本土風景都在這樣的敘事策略裏，流露出與心目中神州相仿的情調。例如〈臺陽形勝賦〉提及的地點遍佈臺灣西部南北，但章甫的行跡僅限於臺南、高雄一帶，可謂虛實參半，於是對彼岸的神遊與對彼岸的神遊，便憑藉書寫交融起來想像臺灣，同時也在想像中國。〈臺陽形勝賦〉起首即串連了兩者的關係：

²² 施懿琳指出清廷雖將臺灣納入領域，「但是在心態上仍將臺灣視為『海外異域』……領臺之初，清廷對臺灣的認知仍是極浮面而粗疏的……根據清朝來臺遊宦人士心中的概圖（schema）所衍生出來的文字書寫，往往充滿濃厚的「異域想像」（exoticism）。」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2000），頁65-94。

²³ 清·高拱乾，〈澄臺記〉，高拱乾纂修，周元文增修，《臺灣府志·卷10》，頁479-480。

²⁴ 申惠豐，〈帝國的審美與觀視：論臺灣八景言說的建構及其美學意識形態〉，《臺灣文學研究》1卷2期（2016），頁100。

維瀛島之遐陬，本閩方之舊俗；自風濤、石鼓以發源，歷白畝（亩犬）、關潼而成局。地鄰日本，圍四省之屏藩；野度女牛，歸雙星之統屬。臺何以號？山峙其高；灣曷由名？水流而曲。皇初而降，誰開日月鴻蒙？明季以來，方鑿乾坤渣滓。我國家簡命特頒，靖海侯興師而起；王化覃敷，民風醇美。用標形勝之宏，乃入版圖之紀。（頁61-62）

就空間言，臺灣是清朝疆域的邊遠一隅，山勢亦發端自對岸，甚至連星宿的配屬都相同；就時間言，則強調臺灣沿循福建的習俗，並且以明代作為開鑿渾沌、告別蒙昧之文明起點。這種觀點與官方地志並無二致，也承襲了宦遊文人之追溯方式，例如張從政〈臺山賦〉「脈固發於閩嶠」、²⁵ 王必昌〈臺灣賦〉「其山則祖龍省會，五虎門東。沿江入海，徑渡關潼」等，²⁶ 都透過地理形勢來訴說兩岸歷史的前後繫屬，頌揚清廷廣施教化的卓偉成效。²⁷ 後採取駢賦的形制，按照方位逐一進行鋪排：

東則城築永康，里歸新化。木岡浮翠以至今，柳岸拖藍而如昨。龍潭釣月，山河影入輪中；猴洞嘯風，花果香流谷下……西則水濱遠眺，澤畔吟行；浮雄關之重鎮，通晚渡於安平。鹿耳一門，約春潮之信到；鯤身七線，連漁火之燈明……南則鳳曾紀瑞，龜亦沐仁；半屏列

²⁵ 張從政，〈臺山賦〉，許俊雅、吳福助編，《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72-74。

²⁶ 王必昌，〈臺灣賦〉，許俊雅、吳福助編，《全臺賦》，頁82-87。

²⁷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這一名稱源於早期西拉雅族對臺南安平一帶沙洲的稱呼，荷蘭人在此建城之後，便沿用此稱，並以其語言音譯為「Tayouan」；漢人亦以閩南語音譯，定為「大員」或「臺灣」等詞，以1603年陳第〈東番記〉所載「大員」為目前可見最早文獻記錄。明鄭時期，普遍以「臺灣」指稱臺灣島。1684年，清廷納臺灣入中國版圖，康熙皇帝定名為「臺灣府」，隸屬福建省臺灣廈門道，「臺灣」一詞正式成為全島的名稱。參考山崎繁樹、野上矯介著，楊鴻儒譯，《臺灣史1600-1930》（臺北：武陵，2000），頁16-17；簡後聰，《臺灣史》（臺北：五南，2002），頁12-13。由此推判，章甫「臺何以號？山峙其高；灣曷由名？水流而曲」等句為個人獨特的說解，經過重新定義，將這座島嶼多山、環海之地理特質突顯出來，是一種文學性的再創造，甚至可視為「重新命名」的活動，隱約暗示了漢文化對臺灣的詮釋權。於是「臺灣」二字不再只是語音轉寫的結果，更承載了山高水曲之島嶼意象，或多或少對臺灣人士的自我理解產生影響。

畫，打鼓羅珍。六根莊，簇諸番之村舍；二層析，畫兩邑之界垠。崗山累石成岩，兔多鑿窟；淡水隔溪喚渡，客過問津……北則金包黃，玉山白；沙連青、火山赤。紗帽環山，旗竿立石；燕霧巢成，雞籠雪積。雲既蔚以成嵐，川亦流而為澤。（頁62）

〈臺陽形勝賦〉分東、西、南、北四方，羅列出臺灣重要地點。其中，西方所列集中於今之臺南，再將範圍遠擴至澎湖列嶼和海峽水道；至於另外三方，包含大量章甫只聞其名的地名，尤其北方一段所述涵蓋範圍極廣，起自臺南、迄於基隆，許多重要市鎮或自然景致皆付之闕如，呈現出大幅空白，透露了無從著力的陌異感。與沈光文〈臺灣賦〉以降類似賦作比較起來，²⁸〈臺陽形勝賦〉是涵括最多本土地名的一篇；此作雖同樣秉持「體國經野」之功能，仍具有相當濃厚的政治意涵，但主要集中於描繪奇麗的山光水色，已經極力敷演臺灣獨特的地域特質；不過，景與景之間，皆以充滿逸興的遊觀方式來連接，將釣月、吟行、約信、喚渡、問津等含帶古典情致的動態置入，從而鋪衍出一幅幾乎沒有雜質的非現實地圖。在精巧的字詞裏，章甫淘汰了過去臺灣賦中經常出現的戰爭、貨殖、物產、習俗等面向，淘洗掉鄉野氣息與泥土味，形成一個僅存地理座標之純粹空間，傳達著屬於騷人墨客的目光，也讓這塊土地符合心中的審美標準，暗示這並非在文化層面有所匱缺的貧瘠之島。

此賦以府城作為輻輳點，體現了臺灣豐富多姿的面貌，儘管章甫未必確實涉足文中記載的地點，卻營造出一個自我漫遊的過程，從而表達對家鄉的真摯情感。然而，因全篇繼承了漢代以降都邑賦、乃至魏晉山林賦對地理風物的陳列方式，格局方正而穩妥，再加上充滿文化底蘊的符碼，是以展現出與中土相仿的秩序；文後氛圍陡然一變，引出臺灣為「兩洋設天險之關」、「萬島拔地雄之勢」之戰略意義，與多數臺灣賦的作用類似，皆替清帝國的

²⁸ 此類作品包括沈光文〈臺灣賦〉、林謙光〈臺灣賦〉、高拱乾〈臺灣賦〉、張從政〈臺山賦〉、陳輝〈臺海賦〉、王必昌〈臺灣賦〉、卓肇昌〈臺灣形勝賦〉、林夢麟〈臺灣形勝賦〉等，藉由全面而系統地描繪臺灣山川、物產、形勢、風俗等，從而證臺灣是中國東南的屏障，永久的砥柱。參考邱清麗，〈清代臺灣形勝賦與漢代「散體大賦」體裁的比較〉，《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130期（2012），頁32-46。然章甫〈臺陽形勝賦〉在形制和語言風格上都屬於駢賦。

榮盛進行見證——差異在於，本土出身的章甫並未懷著明顯的放逐意識，²⁹ 儘管他勾勒的臺灣亦具有桃花源般的夢幻色彩，卻未流露出錯失時空的迷離感，而是堅定地反駁人們對臺灣「未消邊瘴」、「迥異通都」等偏頗印象，一再強調故鄉值得稱誇、足以「典冊天家」，傳遞著終於能回歸原鄉（「乃入版圖之紀」）的喜悅。

三、赴閩之行與雙鄉意識的產生

出身與認同不僅是地理及文化問題，更是歷史、甚至政治問題。自康熙年間設立臺廈道之後，臺灣即與廈門共署，隸屬於當時的福建省，直到光緒13年（1887），臺灣始獨立設省。由於行政區的劃分，章甫自然視自己為閩人，故福建對章甫而言即是原鄉。當時出身於臺灣且卓有成績的作家較少，所以將欽仰的前賢擴及閩地人物，這樣的身分認同在章甫作品時有所見。

《半崧集·自序》中，章甫提及自身理想的生命典範為吾野先生——明代詩人黃克晦（1524-1590），³⁰ 他對黃克晦超然物外、因避世而離家出遊，足跡幾遍全國的事蹟頗為憧憬。章甫詩作〈讀黃蓮士「鳳山拜黃吾野墓詩」感咏〉云：「處士聲名書畫詩，鳳山宿草幾多時！黃公獨拜先生墓，三絕風流七字碑」，³¹ 詩且自註：「吾野先生工詩善書畫，時稱三絕。遍遊宇

²⁹ 林美清，〈清代臺灣賦中的放逐意識〉，《長庚人文社會學報》4卷1期（2011），頁119-151。

³⁰ 黃克晦，字孔昭，號吾野，為明世宗嘉靖、隆慶至神宗萬曆年間重要詩人，生於福建惠安，曾由粵入楚、吳，抵金陵，又歷齊、魯、燕、趙，所到之處，多和當地名士唱酬，著有《金陵稿》、《北遊草》、《薊州草》等詩集，現存一千四百多首詩，由其後人刊成《黃吾野先生詩集》。

³¹ 清·章甫，〈讀黃蓮士「鳳山拜黃吾野墓詩」感咏〉，全臺詩編輯小組編，《全臺詩（第參冊）》，頁402。黃蓮士即黃斌，清乾隆年間晉江人，亦屬福建。周凱《廈門志·卷13》載：「黃彬，字蓮士；晉江人，寓廈賣書。篤志力學，不務外飾。處世接物，一本於真。而內嚴外寬，胸中涇渭甚明，臧否不形於口。人以其坦易，無賢愚皆樂親之。與張錫麟、薛起鳳、林明璉、莫鳳翔、張承祿（二失名）結雲洲詩社，號雲洲八子。所著有《草庵文集》二卷、《草庵詩集》四卷、《看山樓唱和詩》一卷」。清·周凱，《廈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569。

內，名振京華」，³² 即可看出章甫的欣羨之情，而在晚期〈遊火山記〉亦認為黃克晦的詩作自成一格，稱之為「吾野派」。章甫為何特別認同黃克晦？除了肯定其詩歌創作的成就以外，亦因自己與黃克晦一樣畢生未居功名，並將之視為同鄉前輩有關。又如章甫於乾隆45年（1780）二十六歲，初次赴閩時曾作〈遊清源洞記〉，細緻地描繪這一名勝的物情：

清源洞者，閩南第一山也。周圍數十里，聳峙百餘丈。雲根插天，故又號「齊雲」。環山之巖六六，類皆肖狀；而名概以「清源」者，統所宗也。記少時父老云：北山上純陽、紫澤二洞，傳有仙真飛昇事。中之杖藜泉，味甘潔；當年以水名山，是之取爾。吾鄉搢紳先生讀書山房，登雲梯而上鵬程，由此其選；蓋自唐、宋迄今代，不乏人也。（頁68）

清源洞位處於清源山中峰頂端，又名「純陽洞」，建於南宋紹興年間，號稱「天下第一洞天」。章甫開篇即述說其美稱、由來、地位和個人見聞，此篇遊記以自然與人文交匯，對後者的著墨其實更多，「父老」、「吾鄉搢紳先生」等詞即刻意營造出一種理所當然的熟悉感，彷彿從年幼就聆聽長輩訴說此山景色與相關事蹟，將自己所居之地與閩南緊密相繫，表露了自己的身分認同。〈遊清源洞記〉既是章甫至福建應考所作，在將福建與臺灣視為同一行政區域、並推崇當地前賢為楷模的同時，或許也有尋求官方人物及同儕接納的潛在意味。其後敘述庚子年春「屐游茲山」的過程，行於山水之際，亦隱含加入閩南菁英的自我期許：

俄而僧出雲間方丈裏；茶話畢，自云年稀古矣，傳燈至此幾十世，備悉茲山巔末。其上洞蛻巖者，裴仙人尸解處也；其下洞丹竈者，蔡真人修煉所也。且遙指山半，歐陽先生石硯在焉。余以古今事傳聞異辭，俱弗深考；唯是一二仙蹤未泯，則父老所談飛昇事，不誣也。因思鄉先生讀書其中，如歐陽公首先登甲，舊址雖存，風流邈矣；其它名湮沒而不彰者，何可勝道！相與感慨係之。（頁68）

³² 章甫自註：「蓮士詩有『鳳山無數累累塚，獨拜先生七字碑』句。」此處鳳山非臺灣南部地名，而是黃克晦葬身的泉州東門外鳳凰山。

「歐陽先生」、「歐陽公」指的是唐朝歐陽詹（755？-800），於德宗貞元8年（792）與韓愈等名士同登進士，位列第二，時人稱「龍虎榜」，為福建省首位「甲第」進士，³³ 留有遺址供來者憑弔。在這一段落，章甫藉由與福建歷史的連結，並上溯至唐朝，使自己融入帝國版圖之中，不再是身處於邊陲地帶的「化外之民」，清晰地透顯出從中原視角出發的觀點。此種觀點與宦遊文人之臺灣書寫形成值得深思的映照——申惠豐曾以楊廷耀為《臺灣府志》所作〈序言〉為例，提出宦遊文人往往將自身置放於「文明／進步」的脈絡之中觀看臺灣這個「野蠻／落後」之地，他們帶著優越的眼光，突顯了二元對立的結構；³⁴ 而章甫對閩地的高度認同，使他極力弭平臺灣相對於中國之異質性，看似否定這個二元結構，實際上卻是被此結構制約的另番呈演。

因此，章甫筆下的「原鄉」與「故鄉」的關係是多重的，在不同的時間或場合裏，會產生不同的理解與情感，並非處於恆常穩定的狀態。〈遊清源洞記〉一文所折射的，是兩者互補互攝的和諧關係，是一種雙重認同；換句話說，原鄉與故鄉的存在並未造成身心斷裂感，反倒成為章甫視域得以開展之重要條件，中國－閩地因其豐贍的文化資源而成為可歸返的夢土，也使臺灣原本略顯平淺的知識基盤獲得延伸。然而，章甫歸返原鄉，實則是造訪從未謀面的異鄉，故他於前往福建參試時寫下〈放洋〉：

鹿島駛飛航，橫衝大、小洋；耳聞催發棹，背指遠離鄉。

風便波無力，潮平月有章；澎峯奇六六，畫界水中央。³⁵

此詩抒發由鹿耳門經澎湖前往廈門的心情，吐露了「背指遠離鄉」、孤身探入陌生地的傷懷。詩題下有短序云：「臺、廈水程，大小兩洋俱橫流。自鹿耳門抵澎為小洋，屬臺界；由澎抵廈為大洋，屬廈界」，漂浮於茫茫大海，

³³ 韓愈〈歐陽生哀辭〉稱：「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實誤，福建第一位進士應為薛令之，出身長溪（今福安）。歐陽詹實為福建第一位「甲第進士」。參考李啟宇，《閩南先賢》（臺北：河洛，2009），頁10-13。

³⁴ 申惠豐，〈帝國的審美與觀視：論臺灣八景言說的建構及其美學意識形態〉，頁79-132。

³⁵ 清·章甫，〈放洋〉，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21。

章甫首先感受的是臺廈之間的區隔，而非透過書中獲取的知識，將心目中的文化想像寄託於即將抵達的都邑——這場旅程製造了一個出入、往返臺灣的契機，正因為有了「離境」的具體行為，才讓章甫察覺自己的悵然，隱約意識到對這塊生長於斯的土地懷著深切情感，也提揭出「鄉」（故鄉）與大陸地區終究有所差異。而〈中秋出閩，夜遊三山〉一詩，主要在表現科舉結束之後的輕快感，赴考的文士聚集於福州這座名城，彼此透過科舉而相識、結伴，故云「遊人多異地，試客盡同群」，³⁶ 實則在身分上多是不熟悉此地的異鄉人，還沒來得及累積足夠的經驗為這裡的山水賦予獨特意義，使得章甫只能進行「燈爛光欺月，歌高響遏雲；榕城好風景，隨處挹清芬」如此模糊的描寫，無法展開具有歷史或地理厚度的敘述。〈輓亡友李瑾卿（八首之四）〉云：「屈指還鄉數夕晨」，³⁷ 則提及西渡赴閩之後，思歸心切，尤其是好友李瑾卿於這段期間病逝，更讓他急欲迴還。此次離開臺灣，使章甫體認到原鄉畢竟有別於故鄉，察覺自己對兩者抱持的歸屬感仍有深淺之別，很可能成為引觸本土自覺萌芽的契機。

因此，〈遊清源洞記〉後文不再盤桓於原鄉心緒，而是將目光放得更加廣遠，流露出一不受羈絆的企求：

陟其巔，坐盤石。俯瞰三台直下，雉堞、人煙星羅碁布……遂放眼閩海之東，琉球、日本恍惚浮沉，煙水蒼茫不可涯際……已而，山僧告予以陽斜。少頃，白雲封洞，予唯唯下山。過半山亭，憩少許；回首浮圖古剎，已落昏黃外矣。樵客喁于，相率而歸。臨歧，東指曰：「過此里許，即城闕也。請辭於是」。背山麓，渡石橋，竟望江村行歌而去。（頁68）

章甫於山巔進行俯瞰之後，並非朝西方或北方回顧中土，轉為向東眺望大海另一端的琉球、日本，隱約透露出神州大陸並非心中旅程的終點，而是通往無限天地之歷程的一個階段。此處「琉球」、「日本」，與其說是實際的地

³⁶ 清·章甫，〈中秋出閩，夜遊三山〉，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25。以下「燈爛光欺月」等句頁數亦同。

³⁷ 清·章甫，〈輓亡友李瑾卿（八首之四）〉，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99。

名，毋寧更接近想像中的未知領域，但在乾嘉時期，臺灣文人對異國的描述尚不多見，由此傳達了章甫開闊的眼界。古詩〈與鄭君弼遊鷺江諸勝〉亦云：「眼入青霄裏，心雄碧海中」，³⁸ 在廈鼓海峽一帶遊覽時，章甫亦表現出向外拓伸的視角，符合求取功名之躊躇滿志的情境。

值得注意的是，〈遊清源洞記〉後半出現了山僧、樵客兩個人物。山僧對清源山各處遺跡如數家珍，儘管章甫認為其講述的歷史傳聞不足以深究，仙神之說卻頗有價值，含蓄地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異於一般士人，據此可以理解，文末行歌而去的樵客之存在感為何更勝於占了大半篇幅的山僧。章甫與樵客相率而歸，臨歧分道時，樵客為章甫指示方向之後才請辭離去，而歌吟猶自不盡；樵客所指，使章甫隱約掌握了將行之路，延伸出一幅雖模糊卻可辨識的前景，透露著一種對當地生民不落言筌之嚮往。

四、回眄斯土：遊觀方式的改變

章甫筆下提及的景名甚多，然而實際親臨的地點極少，泰半是想像之中的筆墨山水。《半崧集·自序》稱其理想為「遍遊宇內、隨處寄興」，³⁹ 但是，體質配合不上心境，章甫一乘船就嚴重嘔吐，所以在三次赴福建考試不第之後，即不再渡海。⁴⁰ 如此，章甫的行踪從三十二歲以降便局限於臺灣南部，終其一生未曾踏出閩地，自此足跡限於目前嘉義、臺南、高雄地區，深以為憾。儘管活動範圍甚狹，未能遍覽神州名勝及掌握臺灣島嶼全貌，然而，章甫曾沿襲康熙朝、乾隆朝以來著名的「臺灣府八景」，作《臺郡八景》、《臺邑八景》組詩，這些景名亦見於〈臺陽形勝賦〉。

明代即有八景詩的創作，而臺灣八景詩可謂其流變。⁴¹ 由康熙朝至乾隆

³⁸ 清·章甫，〈與鄭君弼遊鷺江諸勝〉，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21。

³⁹ 清·章甫，〈原序五（自序）〉，《半崧集簡編》，頁11。

⁴⁰ 王國璠評斷章甫時曾說：「惜半崧畢生未出閩疆，倘得遍遊宇內，訪吳越之形勝，歷京師之鉅觀，其篇什之富，當數倍乎此也。惜其山水筆法之妙，竟囿於臺、閩之地」。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新竹社會教育館，1974），頁60。

⁴¹ 臺灣八景詩最早見於高拱乾所編《臺灣府志》，同時收錄高拱乾、王善宗、齊體物三人詩作，究竟誰最先提出「八景」，已不可考。參考劉麗卿，《臺灣八景與八景詩》，頁30。另外，廖雪蘭認為王善宗、齊體物來臺較早，寫作八景詩的時間或許早於高氏，故質疑連橫等傳統史書列高拱乾為最先之說。參考廖雪蘭，《臺灣詩史》（臺北：武陵，1989），頁93。然而，八景中的斐亭、澄臺，均由高拱乾所

朝，八景景名略有更易，隱約可以看出時代的脈動，但各家擇定的八景亦不免有部分歧出。創作八景詩者多是宦遊文人，他們既具有懷古心緒，又藉此作為解消對臺灣的陌生感、提供清廷治理臺灣的方向，透過確立哪些景觀為具有美感的指標性景觀，可以獲取對臺灣的命名權，也幾乎掌握了相關詮釋。⁴²

許惠玫曾歸納出宦遊文人之八景書寫有以下幾個特色：「以大陸之景比擬臺灣之景」、「以中國之史取代臺灣之史」、「在詩作中不去提及臺地地名，對於較為特殊的『地名』，方在詩中稍有提及，以便點題」、「王道教化意味濃厚」，⁴³章甫的詩文雖不免被這些書寫方式所滲染，但因為他對土地的親和度遠遠大於宦遊文人，也沒有強烈的政治意圖，故其八景書寫之特色也就有所差異。

以下將康熙、乾隆兩朝八景，與章甫〈臺陽形勝賦〉提及的八景製表對照如下：

表一 〈臺陽形勝賦〉與康乾兩朝之八景對照表

康熙朝「臺灣府八景」	章甫〈臺陽形勝賦〉 (臺郡八景)	乾隆朝「臺陽八景」 (臺邑八景)
安平晚渡	安平晚渡	鹿耳連帆
沙鯤漁火	鯤身漁火	鯤身集網
鹿耳春潮	鹿耳春潮	雁門煙雨
雞籠積雪	雞籠雪積	鯽潭霽月
東溟曉日	東溟曉日	金雞曉霞
西嶼落霞	西嶼晚霞	赤崁夕照
澄臺觀海	澄臺觀海	香洋春耦
斐亭聽濤	斐亭聽濤	旗尾秋蒐

建，即使王善宗、齊體物來臺時間較早，後二景也須於高拱乾建造之後方能撰寫。另如林夢麟（1736?-1795?）〈臺灣形勝賦〉，除寫山川、物產、民俗之外，同樣將此八景逐一寫入。

⁴² 陳佳玟，〈滾滾波濤聲不息，斐然有緒煥文章——論清代臺灣八景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臺灣生態文化研討會》（花蓮：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2000.7.7-9）。

⁴³ 許惠玫，〈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頁154-155。

兩組「八景」的觀看重心略有差異，至乾隆朝才確立的「臺邑八景」之本土色彩更加顯著，從同一地點的對照便能看出箇中區別：「鹿耳春潮」強調自然景色，不似「鹿耳連帆」還關乎經濟交通；以視角而言，於岸邊即可照覽的「鯤身集網」，比起只能從海面上遠眺的「沙鯤漁火」更靠近捕漁現場。另外，「赤崁夕照」之建築觸及1624年至1662年荷蘭勢力的統治，初步超越了清領意識，較「西嶼晚霞」更清楚地反映了臺灣歷史沿革，而「香洋春耨」、「旗尾秋蒐」皆屬古代重視的農事，明顯更接近庶民生活。由此可以推測，章甫〈臺陽形勝賦〉所敘仍然維持了前八景的選項，應與此賦主要站在仕紳階級的立場進行書寫不脫關係，比較傾向營造一種超越於日常勞動的意境，以拉長距離的矚望方式帶出類似山水畫的空寂虛靈，⁴⁴ 貼合此賦隱含的文人氣息。

然而，章甫的兩組八景詩，各以七言律詩、七言絕句兩種體裁分別歌詠前後八景，可見他有意識地區分兩者：

夜半烹魚眠醉夢，不知身在水中山。（〈臺郡八景（沙鯤漁火）〉）⁴⁵

歸來有客休彈鋏，舉網誰家不得魚！（〈臺邑八景（鯤身集網）〉）⁴⁶

同樣觸及漁業，〈臺郡八景（沙鯤漁火）〉鋪陳出忘卻塵俗、難分天上人間的迷濛感，並懷著成為帝國「天險東南設此關」（頁36）的驕傲；〈臺邑八景（鯤身集網）〉卻借用了孟嘗君典故，表示在這片物產豐富的土地上，不需再像馮諼那樣慨嘆「食無魚」，只要略施勞力就有大量收穫，對臺灣的自豪油然而生，⁴⁷ 描述的景象也更貼合現實——儘管此詩仍然運用中國歷

⁴⁴ 林開世，〈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臺灣人類學刊》1卷2期（2003），頁1-38。引文見頁12。

⁴⁵ 清·章甫，〈臺郡八景（沙鯤漁火）〉，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64。

⁴⁶ 清·章甫，〈臺邑八景（鯤身集網）〉，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86。

⁴⁷ 余育婷詮釋章甫兩組八景詩時，亦認為「呈現的都是一片寧靜、祥和、知足的圖像，充滿閑靜的愉悅……仔細體察章甫對八景的空間表述，可知八景雖不似山川能夠撫慰他抑鬱的心靈，但在平靜無波的背後，卻展現出豐足及詩意的美感，由此亦可想見其對臺灣斯土的認同。」余育婷，〈試論章甫詩歌中的空間書寫與美感特質〉，《臺灣文學評論》9卷1期（2009），頁271。

史，卻是以典故將中國（古）／臺灣（今）進行參差對照，突顯了後者的獨特性。除此之外，〈臺邑八景（香洋春耨）〉一詩援用陶淵明〈歸去來辭〉「將有事於西疇」之句，從順應節氣的耕作而引帶出香洋（今關廟區）因氣候溫暖、蓄水充足，可以提前展開農務，故云「漫說夏耘今尚早，亂苗惡莠妙先期」，⁴⁸亦正視臺灣與大陸不同的區域屬性，傳達了當地百姓的脈息。除此之外，許惠玟亦認為章甫已開始注意「人」在八景中的位置，於〈安平晚渡〉、〈沙鯤漁火〉等詩都更細緻地辨識當地居民的生活樣貌，於〈斐亭聽濤〉一詩也更加注意標誌屬於臺地的特色。⁴⁹

倘若針對兩組詩作進行比較：從〈臺郡八景〉組詩「黃山潮水發源長」、「漫誇八月吼錢塘」等句，⁵⁰呈顯出章甫書寫時的自我定位與〈臺陽形勝賦〉接近，整體而言，他仍嘗試歸返原鄉、強調此岸和彼岸相印相契，隱約流露著主體位置孤懸於大陸邊界的空間意識，透過「望眼賒」、「萬里遐」、「放眼遙空」、「浩淼流波」之類的敘述，持續展現一種向外追尋的心靈動態；然而，〈臺邑八景〉裏的多首詩作已將目光收回，無論是觀望濛濛灑灑落於雁門的煙雨、旗尾山成熟的金色稻穀，或者聆聽夜晚鯽潭裏的漁舟唱晚，皆肯定了現時此地並安頓於斯，透過對世態物華之詠歎，讓讀者體會一種真切且自給自足的鄉野風光。兩組詩作的時代相距不遠，透露出章甫之本土自覺處於初萌階段，並不十分明確，他對中國與臺灣的認同基本上是並存的，也未產生與宦遊文人爭奪詮釋權的想法。

除了〈郡守蔣金竹太史遊龍潭記〉和〈臺邑八景〉組詩之外，章甫尚有七言律詩〈鯽潭月夜泛舟〉、散文〈遊鯽魚潭記〉，都對鯽魚潭進行吟詠，可見這是他多次造訪之處；尤其是乾隆49年（1784）所撰寫的〈遊鯽魚潭記〉，更能表現出章甫遊觀方式的改變。開篇簡單介紹鯽魚潭之形勢位置後，章甫即以「日者春風扇和，有鼓俗意」（頁73）說明此次出遊的動機，與〈遊龍潭記〉側重強調「風流太守雅，不俗吏自安」之心境形成明顯對比，〈遊鯽魚潭記〉更加突顯「俗」字，呼應文後漁翁所云「若者蟹舍、

⁴⁸ 清·章甫，〈臺邑八景（香洋春耨）〉，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87。

⁴⁹ 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頁157。

⁵⁰ 清·章甫，〈臺郡八景（鹿耳春潮）〉，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64。

若者漁莊，是我釣人居也」等庶民生活——事實上，此文已暗含一場雅俗之辨。

章甫以執掌潭務的陳植華為主位，敘述他與四位友人一同照覽的經過，起首雖亦提及琴棋詩酒、臨流觴詠等知識分子習慣的活動，但僅用來表示這原本是一場具有名士風範的聚會。在陳植華的嚮導下，眾人參看各處館舍，以及前知縣章士鳳所留壁書；行文至此，大抵依循前人觀點、按照陳植華之引領而展開照覽，這同時也是官吏或縉紳的習慣路線。然而，其後筆鋒一轉，章甫一行人走入陌生的區域：

少憩，破煙蘿、穿屋舍、過虹橋，將四圍繞遍，見夫雲煙之亂也、林木之古也。零星錯出者，山閣水亭也；望之清漣而無極、不時點綴於天空海闊之中者，鷗鷺忘機也。未幾，晚雲歸洞，萬峰露頂；漁翁告予以薄暮，將有事於釣月。離岸登舫，隨流上下；水月天光，一色萬頃。呼夜杯，發棹歌。遙望岸東一帶，間有燈光點點、半明不滅者，約幾十戶。漁翁曰：『若者蟹舍、若者漁莊，是我釣人居也』。因詳及潭中景興廢巔末。且云『春遊最佳，月夜尤勝』。（頁73）

披開濃密的野生植物、離開人工建物，更大範圍地探訪鯽魚潭周邊。雲煙繚亂，天空海闊，使這趟遊覽不再局限於預設路線，而更為閒適自在；此處林木之古老，或許比起前段的「鼓俗」（古俗）的歷史更為悠久。眼前景物，山水中點綴著建築，人為物事在自然之中不再是異質存在，而能彼此映襯，彷彿到達天人合一的境地，無論時空、山水、林木，皆指向對既有認知的泯滅與超越。隨著天色逐漸昏暗，鯽魚潭周邊變得更為陌生，此時改由漁翁作為嚮導——從當職官員更換為在地居民，引帶出脫逸官方思維的嶄新視野，故章甫一行人不再只是臨岸觀看風景，而是離岸隨流、呼杯棹歌，真正置身於潭中，在心理上亦揚棄了原本預設的風雅娛樂方式，完成了入境隨俗的歡樂互動。

一般酬答紀遊之作，無論寫景、記人或抒情，多半以自身和親友為焦點，但〈遊鯽魚潭記〉近半篇幅都在敘述這位偶遇的無名漁翁及其動態言語。綜理章甫所作詩文，亦有不少對漁翁進行描繪，但意義不盡相同，例如〈漁樵耕牧（四首之一）〉「漁翁蕩漾水中天，最妙相忘不記筌。借問得

魚何妙趣，化機一半躍于淵」，⁵¹ 呈現了一個道家隱者式的存在；〈鯽潭霽月〉詠嘆「漁舟夜唱天心處，風送歌聲鏡裡聞」，⁵² 透過藝術的濾鏡將水邊人家之日常進行美化；而〈釣叟〉「江湖滿地老秋風，莫把垂綸笑此翁。尚有一竿持在手，生涯到底未全空」，⁵³ 則演繹了一個同時含帶著悲涼與曠達意味的形象，也就同時指涉了生活的枯淡與踏實。和上述作品比較起來，〈遊鯽魚潭記〉裏的漁翁更像是貼合當地環境的耆老，他所懷抱的並非通達的處事智慧，而是熟稔於潭內潭外形勢，飽蘊對社會民俗之瞭解。漁翁帶領章甫等文士遙望並詳加介紹的岸東蟹舍、漁莊等，均散佈於可望而不可及之處，反面點出官員或知識分子在認知上的限制，一種廟堂之音無法真正體會的野趣。創作此文時，章甫心境更為疏淡，也就不再刻意尋求官方接納，逐漸從清廷視角解放出來。

在簡練的詩文裏，能夠察見章甫雖喜歡援引典故，卻不欲蹈襲前人的創作心理，儘管他不時調遣或化用淵明、范仲淹或〈越人歌〉等語詞，但在沿承之外，另有一番意義。正如漁翁帶領章甫進入曾被不少騷人墨客描繪過的名勝，卻撥開文字和知識的迷障，讓他們親身領略眼前的景色，重新發掘屬於自己的美感經驗；如此一來，透過與經典的比較，即能從重複中掌握差歧，向書寫當下的時空敞開，而非僵化的複製擬仿。徐慧鈺曾指出章甫「其嚮往的是『雲煙密切深』、『雲深無人至』，可將自己隱藏之山林僻境，然與陶淵明『性本愛丘山』之逸隱之心境，似有差別」，⁵⁴ 即注意到他其實是經由轉換舊有詩文，對現今之生命乘載及鄉土情懷展開回應。在書寫〈郡守蔣金竹太史遊龍潭記〉時，章甫主要連接遠古的文學傳統，以臺灣景點比附大陸名勝，仍著意於兩岸相同之處；而書寫〈遊鯽魚潭〉時，章甫卻在改動中將臺灣景點的特色突顯出來，揭示那久被埋沒的美好，跨出了慣常的觀照方式，側重的是赤崁城異於傳統視野的韻致。

僅就〈遊鯽魚潭記〉本身的架構來看，文章前後推導著雅／俗之層次對比，若再與書寫同一地景的〈郡守蔣金竹太史遊龍潭記〉合讀，更能體現

⁵¹ 清·章甫，〈漁樵耕牧（四首之一）〉，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90。

⁵² 清·章甫，〈鯽潭霽月〉，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86。

⁵³ 清·章甫，〈釣叟〉，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403。

⁵⁴ 徐慧鈺，《鯤島逐華波：清領時期的本土文人與作品》，頁57。

〈遊鯽魚潭記〉深入民間、提攜鄉土的用心。如前所言，〈郡守蔣金竹太史遊龍潭記〉敘述焦點為鉅卿鄉紳如何賞玩，山水及民眾僅是模糊的背景，基本上是篇應酬之文，美則美矣，卻缺乏深厚的識見與真摯的情意。然而，〈遊鯽魚潭記〉的場面雖不如〈遊龍潭記〉浩大，卻因為一行人不斷變動位置，視角亦隨之轉換，於是鯽魚潭乃成為書寫的核心，描繪更為全面且細膩，也更能表達此片美景給予的深刻啟發。〈鯽魚潭記〉的特點在於：它所傳達的既非初識的驚艷，亦非多次重遊之眷戀，而是「溫故知新」——對看似熟悉、或自以為熟悉的景點展開嶄新的再認識，不僅敘述了在舊境中發現新境的喜悅，更刻劃了眼界變革之後的心路歷程。章甫於〈暮春羅峰友人招遊即事時予有歸思〉亦云：「物色原無為，人心慣作緣」，⁵⁵ 山水原為無所依憑的客觀存在，卻有賴觀看主體以情思介入，於是形成注重結構或透射美感之「景」，凝結為觀看前的預期心理，也因此才會產生突破原有視野的變動。

從〈遊清源洞記〉、〈郡守蔣金竹太史遊龍潭記〉而至〈遊鯽魚潭記〉，章甫基本上呈演了一個由外拓轉為內省的過程，他逐漸捨棄攀比中土地貌之書寫習慣，也不再將古代典律當作理所當然的參考框架，而是採取正視臺灣風物的態度，並在有限的空間裏延展出未能窮盡的無限層面。此類手法亦見於篇幅更長、形式更為舒放的樂府歌行體〈望玉山歌〉，章甫在歌行之序文引用陳夢林〈望玉山記〉，刻意留下線索，既暗示詩作受到陳夢林作品的影響，也在對映之中突顯彼此的差異，他不再專注描寫宦遊文人覺得怖懼、奇險的景象，而是著力刻畫「須臾變幻千萬狀，晶瑩摩盪異尋常」的剔透之美，⁵⁶「與在地的口傳文學結合，或許可以看成是中原文化『本土化』的一種現象，未嘗不可解釋為臺灣文士希望不著痕跡地擺脫官方的觀點，試圖在本地找尋一個文化的著根之處」⁵⁷——易言之，章甫承襲了陳夢林玉山書寫所經營的精緻感，並弱化「山下螞蟥如蟻叢，蝮蛇如鬥捷如風。婆娑大樹老飛蟲，攢肌吮血斷人蹤」等描繪之草莽性質，⁵⁸除了消弭宦遊文人面對

⁵⁵ 清·章甫，〈暮春羅峰友人招遊即事時予有歸思〉，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28。

⁵⁶ 清·章甫，〈望玉山歌〉，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19。

⁵⁷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頁83-85。

⁵⁸ 陳夢林，〈玉山歌〉，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壹冊）》，頁410。

臺灣景物的疏離意味，更進一步使用鄉里傳說，表露出此一超塵絕俗的境域確實歸屬於這塊島嶼的內部視野。另外，章甫於〈望玉山歌〉採用虛無縹緲的「崑岡」、「無何有之鄉」等語彙，不再如〈郡守蔣金竹太史遊龍潭記〉那般借煙柳蘇堤來相互比擬，拋卻了以實套實的手法，轉換成以虛襯實之敘述，亦避免將臺灣景物與對岸進行過於直接的連繫，使讀者一定程度保留了想像玉山的餘裕。

值得注意的是，除〈望玉山歌〉之外，章甫還有部分詩作汲取了臺灣民間傳說，例如〈赤崁樓城懷古〉「枉教狡計借牛皮」一句，陳敘荷蘭人騙地築城的故事；⁵⁹〈喝水巖〉詩云：「我輩預知當日事，仙床石上是真機」，⁶⁰其中「仙床石」即演述仙人路過打狗山並點化石頭之奇譚，章甫可能是最早的文字記錄者；⁶¹〈遊打鼓山〉「南遊採果問仙翁」隱約觸及林道乾之妹埋金軼聞「時有奇花異果，入山樵採者或見焉」等情節。⁶²章甫巧妙地將口傳文學融入詩作，不僅呈現臺灣獨特的歷史記憶，也讓古典格律揉合了鮮明的地方色彩。

先前討論的〈臺陽形勝賦〉雖明顯受到傳統史志影響，但章甫歌詠賦中重要景點之一木岡山時，亦使用了類似的手法：

臺郡東北關，距關卅三里。有山號木岡，盤在亂雲裏。
山頭薄雲端，山腳圍雲底。雲歸山面真，勢直摩空起。
我從高處望，望中嘆觀止。眼界放大千，一切皆俯視。

⁵⁹ 清·章甫，〈赤崁城懷古〉，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36。另如〈次廣文吳友山臺陽懷古雜咏元韻（六首之二）〉亦引用荷蘭人以牛皮騙地的故事。參考胡萬川，《臺灣民間故事類型（含母題索引）》（臺北：里仁，2008），頁291。

⁶⁰ 清·章甫，〈喝水巖〉，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77。

⁶¹ 康熙58年陳文達《鳳山縣志》、乾隆29年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光緒20年《鳳山縣采訪錄》等，皆記錄鼓山龍泉寺，但未提及「仙床石」。然而後代部分民間書籍（包括湧泉寺官方的介紹）卻載述了「仙床石」傳說，甚至引章甫的詩為證，由此推判「仙床石」可能為章甫記下的民間口頭傳說。參考陳文達，《鳳山縣志·卷9》（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263；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11》（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266；盧德嘉，《鳳山縣采訪錄·乙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34-35。

⁶² 李宜靜，《明清文獻中的臺灣印象》（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頁43-47。

羅列凡幾山，山山是孫子。允矣少祖山，天生非偶爾。
讀書要信書，得之于郡紀。見說混沌初，乾坤鑿渣滓。
為我問化工，此山何時始？山靈渾無語，終古海天峙。⁶³

木岡山究竟是今日何地，至今仍有不同看法；⁶⁴ 乾隆時期，漢人對臺灣山川形勢的掌握仍然有限，故史籍之描述常見謬誤與矛盾，至嘉慶以後才逐漸修正。章甫對地理的理解並未超越當時普遍的認知，詩中自云相關資料「得之于郡紀」，然諸方志對木岡山的位置記述亦不統一。「眼界放大千，一切皆俯視」、「羅列凡幾山，山山是孫子」等句，洋溢著以木岡山為本位而升起的自豪之感；引人深思的是，章甫在詩中追問山之創始：「見說混沌初，乾坤鑿渣滓」，最後六句沒有提出明確的答案，事實上是帶出更深一層的反思——表面上肯定從書本獲得的知識，卻又感嘆化工、山靈均無法回覆，也就暗指郡紀其實無法解謎。故此詩質疑山脈究竟如何形成，亦蘊含著對史料的質疑，在這追溯不到答案的「天問」之中，已經含蓄地對傳統觀點展開省察，並嘗試動搖過去習以為常的文化邏輯。

五、嚮導角色的引領：對臺灣風物之新探

作於乾隆57年（1792）的〈遊火山記〉，是章甫可考的遊記散文中最晚的一篇。火山在〈臺陽形勝賦〉亦曾提及，即北方重要景點之一的「火山赤」——赤山保山莊，為臺灣自清領時期至日治初期的一個行政區劃，範圍即今臺南六甲區中西部及官田區北部。由文所述，可知章甫曾透過史料略識火山，這是初次到此遊覽，故與先前多次尋訪的鯽魚潭不同，「石徑巉嶢，肩輿艱焉；重溪九九，夏、秋間尤難履遊：蓋搜奇若是難也」（頁70），章甫對險阻的路徑尤其印象深刻，可視為他對本土景點主動探索的新階段：

⁶³ 清·章甫，〈望木岡山〉，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05。

⁶⁴ 或說是臺南左鎮、與嘉義縣相接的草山，或說是內新化與外新化南里的交界處，亦有學者認為是玉山山脈群峰之一，以及高雄和臺南縣界之大烏山的一部份等。相關志書，最早應為清康熙23年（1684）由閩清縣遷臺灣府諸羅縣知縣的季麒光所著《臺灣郡志稿》，然此志未完成，原稿亦不傳世。參考鄭喜夫，〈謝浩「清初臺灣方志『明鄭故物』說」述評——兼述陳烜章《皇清新修臺灣府志》引起的推想〉，《臺灣文獻季刊》58卷2期（2007），頁1-18；毛一波，〈臺灣府志與早期志料〉，《臺南文化》6卷1期（1958），頁48-50。

乾隆壬子冬，予北行；晡後迷途，沿溪東步，望山莊投宿。聞老翁讀書聲，意三家村學究也。聽不了了；奇哉！似讀《漢書》然。扣扉，翁出，有處士風；揖我。茅亭顏曰「亭亭」，昭其潔也。亭中題詩，大類吾野派。薄有圖書，云是三、兩山童，不時訓厥蒙也。詢其姓氏、里居、年紀一切；翁曰：『葛姓，號任天；少如來四歲。未嘗詣郡，癖耽北價葫蘆中書，不識制藝何物。海上來，居赤山保百餘年矣。』予曰：『保以山傳，山以赤名；郡乘火山，毋乃近是？』翁曰：『盍往觀焉！』詰朝邀遊；尾其後，幾不及。予健羨曰：『矍鑠哉！是翁』！（頁70）

遊火山原本就帶著刻意「搜奇」、以「所見」印證「傳聞」之目的。文中出現一位具有嚮導功能的老翁，其名姓與言語都帶有隱士之風，似乎是〈桃花源記〉「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之村人的另種演繹，明顯帶著虛擬性質，又更具備主控全局的動向。此種表現方式可能承襲漢晉以降的「代言」筆法，亦可視為對漢文化的孺慕之情；但重要的是，老翁被賦予打破陳思、重鑄價值的意義——文章起始，老翁尚未現身時，章甫原本揣測這只是一位閭里間見識狹隘的冬烘先生，在與之交流的過程裏，卻逐漸轉為欽佩。乍看之下，葛任天藏書和經歷都不多，教學規模與成就也不如章甫，然而章甫「尾其後，幾不及」，透過跟隨步履表示受其引領，之後則因其說解而調整觀看火山的態度。這般一開始抱持著某種成見，再表現出超越預期狀態之微妙改變，可說是章甫幾篇記遊散文一貫的主題。

在〈遊火山記〉裏，不僅對人物如此，對景物亦如此。故章甫自述在老翁的引帶之下初觀火山，心情頗為失望：

唯是四望無煙，竊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心殊悒悒。俄而翁良其趾，告予曰：『此火坑也』。坑上古木蒼然，水泉湧出，不見火。翁曰：『火亦出此。投以枝立焚，蒸飯且熟。但琉礪氣耳，日間無色，何疑焉；夜則光，雖淋雨不熄』。噫！水火同空，奇矣！木生火上，抑又奇矣！夫論乾坤六子，坎、離最大，木次之。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不知烝母幾經億萬年，鬱結而泄此奇也……是山何以陰陽無別，水流

而火不滅、火熾而木自生耶？……翁曰：『必求其故，則鑿矣。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頁70-71）

文後從《易經》開始，連續援引《尚書》、清代尤侗〈湘中草序〉、⁶⁵ 星相學、《廣輿記》，再加上先前提及的「郡乘」，用以舉證的典籍包括經史子集四部。章甫嘗試以畢生所學來解釋火山奇觀，最終卻被老翁一語道破迷障，提醒他不應以故舊聞錄勉強附會於眼前景物，可謂先前幾篇記遊散文精神的進一步推展。尤其是文末作為總結的蔡方炳《廣輿記》已是當時最完備的中國地圖集，⁶⁶ 然章甫卻云於火山所見，可「補《廣輿》所不載」，即是強調在典籍之外，還有尚未被文字記錄、無法以文字詮說的區域，等待人們發掘，這不僅是古代言意之辨的延伸，也暗示著再如何悠久的書寫傳統，都無法涵蓋臺灣獨特的風物——透過章甫的敘述，臺灣的定位是曖昧且複雜的，既處於帝國內部，卻也有不受疆域約束之異質動能；既被視為華夏歷史的一部份，又能衍生出超離傳統文化框架的知識向度。

就一生活動範圍狹窄的章甫而言，遊火山可算是他觸探地方風物之重要突破，但與早年「遍遊宇內」、「放眼閩海之東」的外放雄心不同；〈遊火山記〉更講究深入且細緻的向內觀照，展履之目的並非追求廣遠的世界，而是期盼對周遭的未知多幾分理解、對文獻或各種訊息裏的異辭進行印證，具有重塑斯土、重塑自我的用意。

需要仔細尋思的是，從〈遊清源洞記〉的山僧、樵客開始，乃至於〈遊鯽魚潭記〉、〈遊火山記〉，章甫之遊記散文裏提及的異人比例極高，甚至連〈望玉山歌〉都詠嘆了一位能識玉山真面目的老翁，因而這類角色未必是現實人物。他們讓這些作品產生故事性，經常出現於由白日轉向夜晚的時間交界點上，總能為初來乍到的章甫增補地方知識或指示方向，引領章甫進入陌生的空間，其話語都具有類似嚮導的功能。然而，〈遊清源洞記〉主旨在追撫古蹟，自有一番感悟，看得出此時章甫仍嘗試投入典故所維繫的

⁶⁵ 清·尤侗，《西堂文集·卷4》（上海：上海古籍，2010），頁42-43。

⁶⁶ 《四庫總目提要》載：「是編因明陸應暘《廣輿記》而稍刪補之。」此書包含明朝至清初十五省分地圖，圖後有各省圖記，文字內容大略分為建制沿革、形勝、山川、土產、祠廟、名宦、人物、烈女、仙釋等十五項。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二·史部二十八》（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頁1504。

正統中，尚未如〈遊鯽魚潭記〉那般反映切實、活生生的庶民視野，對半開發的角隅投以有情眼光，隱約強調了本土的、局部的價值。再者，〈遊鯽魚潭記〉之漁翁的話語雖俚俗樸實卻內涵豐富，相形之下，文章前頭引用的章士鳳「青山不老，綠水長流」壁書看似工整，卻是一成不變、蒼白無力的習套。章士鳳（1753-？）於乾隆18年（1753）擔任臺灣府臺灣縣知縣，後遭福建巡撫鐘音彈劾，罪名為「漁利剝商、縱囚匿報」，旋即遭革職查辦，⁶⁷無論章甫是否暗藏譏諷，但其題刻之句完全無法表現出鯽魚潭的獨特，僅僅是附庸風雅的陳腔濫調，甚至可能倒過來限制人們對景色的體會。

而在〈望玉山歌〉裏，老翁看似熟悉鄉里傳奇的耆宿，也可視為章甫將陳夢林之詩文擬人化的藝術設計；他不僅識得玉山的真實樣貌，還講訴了蘊含玉石、鑿山採玉等軼聞舊事。不過，老翁所云只是「須臾變幻千萬狀」的其中幾個面向，末尾再加入一尊山靈作為老翁的對照——既然章甫需要老翁的指點，即表示他過去掌握的文獻資料並不完整，而「山靈歸去將誰說」卻又意謂著老翁所云亦不充分；玉山的精奧最後仍籠罩於雲彩煙霧之間，無人知曉，最後只能發出「大璞自然天地秘，未知韞匱何處藏？」之慨歎，⁶⁸留下沒有解答的空白，進一步反思對世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缺憾，也提醒自己不應該執著於既有言說。藉由「且將一片餘光好，袖來寶貴入詩囊」之「餘」字，章甫含蓄地指出：無論是陳夢林的原作或自己的再書寫，都只能截取玉山片段的丰采，文字紀錄原即是浩瀚宇宙遺留在這個世界的剩殘物。

如此再與〈遊火山記〉互相對照，文中老翁自稱葛任天，汲取自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從他對一己年齡（少如來四歲）、經歷（海上來，居赤山保百餘年）及喜好（癖耽北價葫蘆中書）等簡介，幾可斷定這是章甫創造出來的角色，亦可詮釋為章甫與內在自我的對話。老翁為章甫指明火坑的位置、釐清人們對火坑的錯誤認知，同時又介紹了水火同空、木生火上之特色，這是明顯迥異於傳統詩文的奇景，呈現的亦非「虛」、「淡」、「靜」、「遠」等古典山水意境，而是一次難以被慣習的觀看方式所羈約、無法被妥善表達之獨特審美過程。倘若「嚮導除了帶路之外，也同時是一

⁶⁷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高宗實錄選輯（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頁112-113。

⁶⁸ 清·章甫，〈望玉山歌〉，施懿琳編，《全臺詩（第參冊）》，頁319。

位文化符碼的解碼者」，⁶⁹ 那麼，老翁在全文裏便逆轉且擴充了嚮導的意義——他將章甫未曾經驗的空間轉化為已經經驗的空間，卻又提出「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頁71）之告誡，反對讓火山淪為引譬用典的借喻客體、反對以陳舊的語言將這片土地納入固有的規範，更強調那不可經驗性才是彌珍貴的。

六、結論：待書的未來

本篇論文以〈郡守蔣金竹太史遊龍潭記〉（乾隆36年）、〈遊清源洞記〉（乾隆45年）、〈遊鯽魚潭記〉（乾隆49年）、〈遊火山記〉（乾隆57年）四篇遊記散文作為核心，並參酌駢賦、詩歌等作品，分別呈現章甫從十七、二十六、三十至三十八歲之關懷重心的移易。

章甫的遊記散文雖僅存四篇，卻能從前後觀照方式的變化、敘事策略的同異中，展露出作者在書寫山水時逐漸開啟的本土視角：若按時間先後，最早的〈郡守蔣金竹太史遊龍潭記〉深受傳統美學影響，敘述時習慣追求臺灣與大陸景點的重合之處，基本上呈現出以中原為主的意識；〈遊清源洞記〉刻畫對岸名勝，目光向外，卻隱約在「故鄉」與「原鄉」的連結之中，產生了孰輕孰重的疑問；撰寫〈遊鯽魚潭記〉時，章甫已開始反思自己對家鄉之理解不夠深刻，故視點由外收回，更加突顯林野環境及庶民生活；至〈遊火山記〉則尋訪了未知的荒僻之地，清楚地表現出以臺灣為本的探勘立場。若以空間位置而言，文章所敘僅清源洞一景不屬於臺灣，但鯽魚潭、火山對章甫之熟悉程度亦不相同，遠／近、虛／實並未在其思維裏發生明確作用，他更傾向於變動地描摹或想像各地環境的細節，不但強化了對庶民生活的著墨，也對土地之意義提出形而上的叩問。

從臺灣文學的流變來看，章甫於詩作突破了工整的對仗、刻板的押韻，更懂得用字煉句之類的精緻手法，而散文也開始講究宏闊的結構、善用前後對照，並嘗試設計角色與之互動，藝術價值始得以大為提高。這些具備嚮導功能的角色經常暗示著章甫的獨特取向，更打破了他原本抱持的既定觀點，從而重新探索或審視眼前景色，使其遊記成為一種帶著高度省察力的風土表

⁶⁹ 賴維菁，〈觀景・景觀：檢視三部維多利亞時期遊記如何書寫「番邦」的自然景物〉，《中外文學》29卷6期（2000），頁100-119。引文見頁102。

述，尤其是〈遊鯽魚潭記〉與〈遊火山記〉兩篇，都表現出「遊前之我」與「遊後之我」的差異；在過去與現在的互映中，透過章甫的認知翻新而呈現出不曾被注意的面貌。

山水其實是一種文化象徵符號，在章甫的學思歷程裏，最初以大陸為精神根源及審美依據，爾後才領悟出臺灣景物本身的意義，逐漸擺脫宦遊文人疏離的觀看姿態與修辭方式，使其筆下這座島嶼偶見俚蕪卻豐盈自足，也改變了原本依附於清帝國的空間屬性。章甫之地景書寫迴映出乾嘉時期本土文人理解自我的轉折，敘述中不可不書、卻又不能盡書的留白，既懷著深沉遺憾亦帶著期許，具有將進一步的探索託付給未來的企盼。

引用書目

一、古籍文獻

- 清·尤侗，《西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2010）。
-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 清·周凱，《廈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清·季麒光，《蓉洲詩文稿選輯》（香港：香港人民，2006）。
- 清·高拱乾纂修，周元文增修，《臺灣府志·卷10》（臺北：遠流，2004）。
- 清·章甫，《半崧集簡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 清·陳文達等纂，《臺灣縣志》（臺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95）。
- 清·藍鼎元，《東征集》（上海：上海古籍，2010）。
-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臺灣先賢集（第二冊）》（臺北：臺灣中華，1971）。
-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施懿琳編，《全臺詩》（臺北：遠流，2004）。
- 連橫，《臺灣詩乘（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5）。
- 許俊雅、吳福助編，《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 陳漢光編，《臺灣詩錄（中）》（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
- 陳文達，《鳳山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黃哲永、吳福助等編，《全臺文》（臺中：文听閣，2007）。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高宗實錄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二、一般論著

- 山崎繁樹、野上矯介著，楊鴻儒譯，《臺灣史1600-1930》（臺北：武陵，2000）。
- 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新竹社會教育館，1974）。
- 毛一波，〈臺灣府志與早期志料〉，《臺南文化》6卷1期（1958），頁48-50。
- 田啟文，〈清治時期臺灣遊宦散文的特色及其影響〉，《東海中文學報》17期（2005），頁93-126。
- ，《臺灣古典散文研究》（臺北：五南，2006）。
- 申惠豐，〈帝國的審美與觀視：論臺灣八景言說的建構及其美學意識形態〉，《臺灣文學研究》，1卷2期（2016），頁79-132。
- 向麗頻，〈清代臺南地區詩文社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明清時期的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2002）。
- 余育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新北：稻鄉，2012）。
- ，〈試論章甫詩歌中的空間書寫與美感特質〉，《臺灣文學評論》9卷1期（2009），頁264-280。
- 李汝和等，《臺灣省通志：人物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11）。

- 李啟宇，《閩南先賢》，（臺北：河洛，2009）。
- 李知灝，《從蠻陌到現代：清領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景書寫》（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 李宜靜，《明清文獻中的臺灣印象》（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
- 林美清，〈清代臺灣賦中的放逐意識〉，《長庚人文社會學報》4卷1期（2011），頁119-151。
- 林開世，〈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臺灣人類學刊》1卷2期（2003），頁1-38。
- 邱清麗，〈清代臺灣形勝賦與漢代「散體大賦」體裁的比較〉，《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130期（2012），頁32-46。
- 胡萬川，《臺灣民間故事類型（含母題索引）》（臺北：里仁，2008）。
-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2000）。
- 約翰·威利（John Wylie）著，王志弘、錢伊玲、徐苔玲、張華蓀譯，《地景》（新北：群學，2021）。
- 徐慧鈺，《鯤島逐華波：清領時期的本土文人與作品》（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 陳佳妉，〈滾滾波濤聲不息，斐然有緒煥文章——論清代臺灣八景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臺灣生態文化研討會》（花蓮：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2000.7.7-9）。
- 陳貽庭，《臺灣才子》（北京：九州，2003）。
- 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 黃典權、葉英、賴建銘纂修，《臺南市志》（臺南：臺南市政府，1979）。
- 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1999）。
- 廖雪蘭，《臺灣詩史》（臺北：武陵，1989）。
- 蔡承豪，〈清代臺灣府署「鴻指園」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8卷2期（2020），頁137-196。
- 鄭喜夫，〈謝浩「清初臺灣方志『明鄭故物』說」述評——兼述陳挺章《皇清新修臺灣府志》引起的推想〉，《臺灣文獻季刊》58卷2期（2007），頁1-18。
- 賴維菁，〈觀景・景觀：檢視三部維多利亞時期遊記如何書寫「番邦」的自然景物〉，《中外文學》29卷6期（2000），頁100-119。
- 賴恆毅，《清代臺灣地理空間書寫與文化敘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 劉麗卿，《臺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文津，2002）。
- 盧錦堂，《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1）。
- 邁克·克朗（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2006）。

簡後聰，《臺灣史》（臺北：五南，2002）。

Costa, Laura Malosetti, “Politics, desire and mem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in the Argentine pampas”, *Journal of Visual Art Practice* 5.1-2(2006), pp.107-119.

